

辽宁人民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散文

广选·新注·集评

韩

愈

卷



出版说明

一、唐宋八大家散文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继承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发展并完善了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影响了元、明、清各代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创作也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学习八大家散文创作经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编写了《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一书。

二、本书收唐宋八位散文大家的作品共 734 篇。其中韩愈 83 篇，柳宗元 75 篇，欧阳修 107 篇，王安石 104 篇，曾巩 91 篇，苏洵 51 篇，苏轼 125 篇，苏辙 98 篇，是目前规模最大的选注本。

三、本书所收作品以作家的别集为底本，参考《四库全书》中《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及《全唐文》、《全宋文》等确定正文。注释力求详尽，使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均能借助注释读懂原文。难解的字词单独释义，个别句子作了语译，对文中涉及的重要典故、历史事实和人物均作了说明。我们相信这些普及性的工作，定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欢迎。

四、八大家的许多作品具有典范性，唐宋及其

以后各代文人均给予很高的赞誉，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评论，或评论作品内容，或揭示作品艺术特征，对今天读者理解八大家作品颇有裨益。为此，我们从众多评论中选录一部分附于每篇文章之后。至于同一篇作品，评论者各抒己见，见解时有抵触之处，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对同一作品理解上的差异。我们适当加以收录，以便读者阅读时加以比较。

五、本书的附录，一是唐宋八大家评论选编。侧重从宏观上评论唐宋八大家创作群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八大家艺术风格，以补本书集评着重篇章评论的不足。二是唐宋八大家文体知识。八大家全面发展了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各种文体知识的规范性介绍，便于读者了解各种文体的发展脉络，各种文体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特点。文体知识的介绍，便于读者从规范的角度进一步理解八大家文章的优长。

六、本书按卷出版，每个作家为一卷，共八卷。每卷作品按文体分类排列，同一类作品按写作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年代不详者分别排在各类之后。

七、本书为辽宁省教育委员会重点资助的科研选题。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辽宁大学科研处、图书馆的大力支持。编委李小菲同志为本课题实施，做了大量工作。本书的出版，有他们的劳绩在内。

八、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原辽宁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现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任慧英同志的全力支持。辽宁人民出版社编审李忠田同志，在本书选题和编撰的整个过程中，都参与了具体的

工作，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本书的编撰者将铭记他们为本书出版所花费的心血和洒下的汗水。

九、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徐中玉教授，对我们编撰这本书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对本书的选题和编撰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使本书的编撰人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对学术界前辈的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十、本书的组稿由各卷主编负责。各卷稿件的审阅亦由各卷主编负责。全书稿件收齐以后，在出版社编审李忠田的参与下，由迟文浚、宋绪连、曲德来同志对稿件作了处理，统一了体例，对个别文字作了些必要的改动。在此过程中，王玉华、鹿桂珍等同志作了稿件的编排和资料核对的工作。

本书编委会

1997年10月5日

总 序

徐中玉

迟文浚、宋绪连、曲德来、朱明伦等协作选撰精编的《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即将出版，敬佩之余，也深感欣喜。

我认为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不仅在唐宋当时就已产生革新文学、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就在今天，我们仍能从他们的文学遗产中继续学习、借鉴、择取到不少普遍性的知识、正当合理的观念、社会生活问题的理解，以及艺术表达上使人易于感悟的能力。不消说，我们今天已比过去增长丰富了不少东西，有条件看到、领会到比过去大些、广些、深远些的问题了，但要知道，一则，这是过去人类、前贤们努力奋斗、寻找，甚至以牺牲为代价追求得来的、积累下的大量成果帮了我们的忙；二则，只是很少人因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才多少真正获得这种帮助，而且还远欠浑透，以致在我们这里还有为数极多的人未有机会因此增长其学识，发挥其潜力，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仍未达到较高的程度。这是非常可惜的。例如，唐宋八大家，仅仅在中国这一隅，在这一隅的唐宋这一段时间内，就已给我们做出了如此难得的贡献，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

事。因为这八位杰出的散文家，积极参加了当时中国志士仁人要求革新时弊，着重从革新文学这一领域作了种种努力，由于吸取了来自民间的许多从思想到语言的清新刚健之气，才做出这种成绩。然而，即使在具有较好条件的中国现代人中能清楚看到这一点的，仍不很多。对唐宋八大家留下文学遗产中尚存的不少生命力，“轻薄为文哂未休”者也还有，对遗产缺乏历史主义的态度，似乎千百年前的作家就应预先知道如何解决今天的问题，似乎那些与我们绝少联系、实际情况大不相同的各种稀奇古怪哗众取宠的“主义”值得大吹特吹，招摇过市。曾有人大言不惭，以为只要大笔一挥，就能把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横扫干净。实践证明，这种极端粗暴的反历史反理性的做法，只能把很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毁灭伤害，他们自己不过是只会狂叫些空洞口号的败家子而已。

唐宋两代最著名的散文大家，自明初以来诸家均推重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洵、苏轼、苏辙。后有增入唐代的李翱与孙樵，而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唐宋文醇》等书出版。要之，一般都以原提八家为代表，可说长期以来已成公论，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八家之文，各有其特殊的风格。大致韩、柳雄深雅健、欧、曾、苏辙纤徐温醇，苏洵、苏轼纵横超旷，王安石刻峭深致。而总的倾向，则都针对当时的社会颓风，批评时弊，各自提出独到的见解。他们反对委靡、浮艳、拘执声韵典故、追求晦涩奇怪，一味以能文

为本的歪风。这股颓风，既是社会颓风的反映，也是阻碍历史进步、否定文学要有正当教化作用的腐蚀力量。他们主张文学以立意为宗，不一味以能文为本，不关心生民疾苦、国家安危。作家具有高尚人格与风骨，比之追求形式，实在更为重要。在具体问题上各人见解可以不同，但必须直道而行，事信而言文。

唐宋八大家散文具有永久的魅力，现在又经诸先生精心注释、深入阐发、博采众评，定能使当代尚未得到这些大家作品直接指引的读者，在这部集思广益内容丰富的读物辅助之下，取得重要的帮助。

1996年11月7日在美国
南卡罗莱那州格林维尔市旅中

前 言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 768），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 824）。河南河阳人（今河南省孟县）。因是昌黎望族，故世称韩昌黎。这个昌黎，一般认定为河北昌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河北昌黎，五代辽时置广宁县，到金代改称昌黎县。显而易见，唐代的韩愈不可能预知金代的事情，提前自称韩昌黎的。那么韩愈所称的昌黎究竟是何处呢？回答是：辽宁义县。义县在西汉时称交黎，是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所。东汉时改交黎为昌黎县，是辽东属国都尉治所。三国时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 229）设昌黎郡，治所在昌黎县。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营州刺史在营州（今朝阳市）城东大凌河北岸（即现在义县城西北 8 公里处），为孝文帝建造一石窟，内有佛像万余（今万佛堂石窟西区）。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 502），散骑常侍韩贞又继续修造石窟（今万佛堂东区）。韩愈为何称自己是昌黎人呢？这是因为唐人门阀观念极深，重郡望而不重籍贯。据《元和姓氏纂》记载，韩愈始祖为汉高祖时所封韩王韩信。韩愈的七世祖韩耆，是后魏常山太守，六世祖韩茂，是后魏尚书令，封为安定桓王。与韩茂同时的

韩贞，就是修建义县万佛堂东区的主持人。值得一提的是万佛堂东区是韩氏家族的私窟。可见韩氏家族在当时的声望之大。到了唐代，有三位宰相都自称昌黎人：韩思复，开元时为黄门侍郎。韩休，字良士，相玄宗。韩休子滉，字太冲，相德宗。攀附有如此声望的门第，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对提高自己的身价自然好处多多。韩愈自称昌黎韩愈，人们也尊称他为韩昌黎，正是唐代这种门阀制度使然。

韩愈生活在一个儒家思想氛围颇为浓厚的中小官僚家庭之中。韩愈曾祖父韩秦唐初任曹州司马。祖父韩𩇛素任过桂州长史。韩愈父亲韩仲卿当过武昌县令，有美政且有文名，大诗人李白与其有交往，曾写过《武昌宰韩公志恩碑颂》称赞他的政绩。韩仲卿兄弟四人，除仲卿以外，还有少卿、云卿、绅卿。韩愈在堂兄弟中间排行第十八，唐人习惯称行第，所以韩愈又称韩十八。他们兄弟中间名字都共有一个人字头，如韩会、弇、愈、俞、介等。韩弇是云卿之子，韩俞是绅卿之子，会、介、愈是仲卿之子。因少卿无子，故韩介过继给少卿做继子。《旧唐书》称会与愈是从兄弟，而《新唐书》则说是亲兄弟。但韩会与韩愈不是一母所生是无疑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与当时的宰相元载过往甚密。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元载贪污受贿案败露，被处极刑，韩会受牵连，被贬岭南韶州作刺史。时年韩会四十岁，而韩愈仅十岁，兄弟相差三十岁，如为同母所生，从生理角度也是说不通的。那么韩愈很可能是庶出，而且父死后，生母可能再嫁，所以在韩愈的诗文中从来没有提过生母，而只提生父。《祭郑夫人文》：“我生不辰，三岁而孤。”《乳母墓铭》：“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尔雅》：“无父曰孤。”三岁而孤，是指出生时就算一岁；未再周月，是指实际上未

满两周岁。

韩会被贬韶州，十岁的韩愈亦随兄嫂同往贬所。到韶州的第三年，韩会病死，年仅四十二岁。韩会无子，以韩介子老成为继。韩会死后，妻子郑氏带着韩愈和老成艰难度日。郑氏很能干，待韩愈极好。辛勤提携，念寒而衣，念饥而餐，情若所生，海化谆谆，常抚所生儿（即老成）指愈而言曰：“韩氏两世，唯此而已。”唐制：嫂死，叔服小功五月丧。郑氏死后，韩愈服丧一年。由此可见韩愈对郑氏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是何等深切。

二

少年时代韩愈的遭遇并不太好。但他聪敏好学，发愤读书，刻苦学儒，七岁能记他生之所习，言出成文。日记数千百言。稍长，尽能通六经百家之学。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涯，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儒学基础。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说：“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到了十九岁，韩愈告别了对他有抚育之恩的嫂嫂郑氏，踏上了求取功名的搏击之途。在嫂嫂身边，他是雏凤，而现在他变成了大鹏，将要展翅高飞了。他在《赠族侄》一诗中说：“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阙，辞家逐秋蓬。”这里我们看到：在一个秋高气爽日子里，满怀一腔热血和积极进取精神的青年学子，奔赴前程的形象。

但是韩愈哪里会想到京城长安等待他的并不是铺满鲜花的似锦前程，而是充满荆棘的人生旅途。韩愈回忆他长安十年奋斗生活时，这样写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唐代的科举分两步：第一步是进士科考试，由礼部负责，但考中以后不能马上授官；接着还应参加吏部博

学宏词科考试，只有这一科考中，朝廷才能正式委以官职。初入长安准备进士科考试时，他参阅了历次考试的试题和试卷，在《答崔立之书》中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无可学而能。”足见他的自信和狂傲。据张岱《史阙》记载：“韩愈入试，陆宣公赞为主司，作《不迁怒不贰过论》。赞阅愈卷，黜之不叙。次年（贞元八年，公元792），宣公复主试，复试是题，愈复写旧作，一字不易，宣公大加赞赏，擢置第一。非愈自信甚真，谁肯落第文字，更去应试；又应举于上年所涂抹之主司！非宣公虚心选择，又谁肯首举昌黎，更首举昔年所涂抹之昌黎！皆当于古人中求之。”这里记的是策论的试题，这一年还有《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这两个题目韩愈也答得不错。韩愈终于经过四年奋斗，考取了进士。主司陆赞虽喜骈文，但有知人之明，这一榜录取二十名进士，其中有欧阳詹、李绹、李观、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人。人称“孤俊伟杰”，这一榜被称为“龙虎榜”。韩愈排第十四名。进京以后的七年奋斗终于有了结果。25岁的韩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的考试。礼部考试主要凭才能，而吏部考试除了才能以外，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居于要职的人予以推荐，要想取得吏部考试的成功，简直比登天还难。虽然韩愈也四处写信请求予以推荐，要么是推荐人地位不够尊贵，要么是人家不予理睬，结果是三次应试均告失败。这时的韩愈已经二十八岁，继续考试求职已无意义。他接连写了三封《上宰相书》，当时的宰相是赵憬、贾耽、卢迈。他首先寄上自己以往的文章，请当权者实际考察自己的才能，然后反复说明自己困窘的处境，以及希望求得一职的

愿望。三封信写得不卑不亢，理直气壮，无奴颜婢膝之态，而有恳直急切之情。把一个求仕者该说的话都说到了，说尽了，但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不能不使韩愈极为愤慨。后人对这三封信的评价颇有微词，尤其是对第二封信《后十九日复上书》中，“乃复自比为盗贼管库，且云大其声而疾呼矣，略不知耻何哉！”其实这是只就字面的“盗贼”、“管库”四字来评论，而没有读懂信的全文。信是这样写的：“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首先，这是一个比喻，布衣韩愈可以与管仲推荐的盗贼，赵文子所举荐的管库相比。而管仲所推荐的盗贼，赵文子所举荐的管库，恰恰都是贤者，均有治国之才，怎么能简单地把这句话理解成就是作者自甘为盗贼和管库呢？“略不知耻”的指责可以休矣。

三

唐代未能通过吏部考试的士子，虽不能由中央政府授官，但仍可以到地方上寻得一官半职。特别是当时的节度使，权倾一方，可以不经中央政府批准，自己任命官员。韩愈离开长安后，到了汴州，在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府，以晋之辟，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实为观察推官。这是一种帮闲式的工作。由于董晋待他不薄，所以一直在这里待了三年。韩愈一直不忘董晋对他的照顾提携之恩。董晋死后，韩愈护送董晋的灵柩去洛阳，他离开汴州的第四天，汴州军中士兵哗变，杀死继董晋以后为留后的陆长源，并生食其肉。幕府中的大小官吏，无一幸免。韩愈幸而早离开四天，不然，韩愈便会在一天早上从历史上消逝了，哪里还会有如此美的文字流传后世

呢？贞元十五年（公元799）秋，韩愈在徐州宁武节度使张建封幕府，辟为节度推官，试太常寺协律郎。宁武节度使担负着防止河北、山东一带方镇叛乱的任务，地位相当重要，但张建封基本上是个花花公子，知人而不善任，当然听不进韩愈的忠言直谏。韩愈文集中留下两封给张建封的信，一封对“展入夜归”的上班作息时间安排提出疑义，认为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抑而行之，必发狂疾”。张建封爱打马球，而且达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韩愈在另一封信中，列举了马球之害以后，气愤地说：“击球事谏执事者多矣，谏者不休，执事不止，此非为其乐不可舍，其谏不足听故哉！”足见韩愈发言直率，无所畏避的性格。他在张建封幕府待了一年多时间便离开了徐州。

又经过两年的奔波，到贞元十八年（公元802），三十五岁的韩愈终于等来了一次京官的任命，职务是国子四门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第二年拜监察御使，级别不高，只是个正七品的芝麻官，但有监察百官，直接向皇帝进言的大权。从此韩愈开始了沉浮不定的仕宦生涯。韩愈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作为一位封建官僚，他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绝不顺眉折腰向权贵低头；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彻底的皇权主义者。他想直言劝谏皇帝的过错，但是在皇帝的淫威面前，他又不得不低下那倔强的头。他有追求，又有挫折；他有理想，又有失落；他有过成功的欢乐，又有失败的痛苦。应该说，在官场上他基本上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从来没有过一帆风顺的日子。就在拜监察御使的那一年，关中大旱，饿莩遍野，他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其中说：“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

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显而易见，这里直接指斥了酷吏的不顾人民死活的豺狼本质，自然为幸臣所恨，皇帝当然也不会高兴。当时的京兆尹李实，深得皇帝宠信。但此文所谈及的灾情严重情况，一则是实情，没有夸饰，二则没有直接点明李实的责任，按说不会招至贬官的处分。新、旧唐书还提到韩愈上书极论官市之弊。所谓官市就是宦官巧借皇帝的名义到市场上为官中采购物品，实则是巧取豪夺，人民苦不堪言。如论官市之弊，一是威胁了直接负责采购任务的宦官利益；二是皇帝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韩愈因此遭至贬官，应在情理之中。但韩愈的文章中没有留下极论官市之弊的文章，因此无法考证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和王叔文革新集团有关。王叔文、韦执谊此时正在德宗面前得势，而韩愈和他们处在政治上对立的派别之中。但韩愈和这一集团中的柳宗元、刘禹锡个人关系相当密切。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作了这样的猜测：“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是不是与朋友谈话语言不慎，祸从口出，遭至贬官，韩愈猜测，但不能定论。因柳、刘二人是他的挚友，挚友能做出出卖朋友的事吗？或者出于无心而使朋友遭殃，亦未可知。总之，韩愈在京官的板凳上还未坐温，一道圣旨下达：贬官连州阳山县令。这一年是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对于贬官的苦况，韩愈后来追忆道：“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领头。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阳山地处岭南的蛮夷之地，人民不开化，温热潮湿，飞虫极多，水土不服，“随事生疮疣”。尽管环境艰苦，韩愈还是做出成绩来。《新唐书·韩愈传》记其在阳山的政绩是：“有爱在民，

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这是韩愈在仕宦的道路上栽的第一个跟头。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德宗死，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在阳山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被赦还，但没有回京，而是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一职（掌地方治安）。韩愈心情沉郁，曾有过回家务农的思想：“行当挂冠去，生死君一访。”在江陵待了半年多时间，顺宗死了，宪宗继位，韩愈又奉调回京授国子监博士一职，这是韩愈第二次担任这一教授生徒的职务。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人们的褒贬不一。为了避开人们的非议，他自请“分司东都”，也就是到国子监洛阳分校任博士，“权知三年，改真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掌刑狱诉讼）。韩愈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在都官员外郎任上，专与宦官作对。宦官掌东都的寺院和道观，为非作歹，飞扬跋扈，“尚书敛手失职”，对此束手无策，韩愈按六典办事，逮捕不法宦官，严加惩处，因此得罪宦官，经常恶言晋辞，相互攻击。韩愈在这个职务上确实干得很累，于是上书尚书留守郑庆馀，请求调离现职。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改任河南县令。河南县境内，魏、郾、幽、镇各方镇均在此有留守官邸，方镇为了谋反的需要，经常在官邸内窝藏罪犯，官府不敢过问。韩愈上任以后，明令禁止，违者严惩不贷，告示一出，留守官邸皆大恐，纷纷收敛他们的不法行为。有人把此事报告宪宗皇帝，宪宗大加赞扬说：“韩愈助我者！”韩愈在洛阳一待六年，有政绩，按说极有可能予以提升。可是与他关系不大的一件小事又使他栽了一个不小的跟头。华阴令柳涧有罪，华州刺史阎济美劾奏之，贬为掾曹。过了数月，阎济美罢官，柳涧借机煽动百姓为其翻案。新任华州刺史赵昌再审此案，再贬柳涧为房州司马。正好韩

愈路过华阴，认为赵昌与阎济美是同党，有意陷害柳涧，上疏朝廷为柳涧鸣不平。于是皇上诏令监察御使李宗爽重审此案，查得柳涧赃物，铁案如山，三贬柳涧为封溪尉。而韩愈以“妄论”罪降为国子博士。这是韩愈第三次任国子博士，一件本不该管的事，而且又对事情的原委缺乏详细的调查了解，使韩愈再触霉头。这里既表现了韩愈疾恶如仇的本性，同时也暴露了他处事不够冷静的人文固有的缺点。尽管这一年他已经45岁。

元和七年（公元812）面对为人师的国子监博士这一职务，韩愈无可奈何，写了一篇《进学解》自解自嘲。全文以师生对话展开，以先生的自嘲和学生的赞誉相结合，构成全文，抒发了才高数黜的内心不平。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绛览其文，赞赏备至，认为他有史才，推荐他做史馆撰修，兼比部郎中（掌赋敛、经费等）。韩愈对史官一职简直可以说是恐惧万分。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引举孔子、齐太史、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曄等人的遭遇，最后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尽管所举写史者的遭遇并不都与写史有关（这一点柳宗元的文章已有反驳），但韩愈穿凿附会，也自有一番说服力。实际上宰相们的眼力还是不错的，韩愈确有史才。他的《张中丞传后叙》写得脍炙人口，是史家之绝调。他写的《顺宗实录》也颇有特色，是至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实录。洪兴祖《韩子年谱》这样说：“进《顺宗实录》，详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宪宗前言其不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史官，韩愈还是继承了“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半年后改考功郎中（掌官员政绩考核），史馆修撰如故，

不久又转为考功知制诰。元和十一年（公元816），韩愈升任中书舍人（掌诏令起草和做皇帝侍从）。这时的韩愈正是春风得意时，因常随皇帝左右，可以直接参预皇帝的重大决策。49岁的韩愈终于迎来了政治上大展宏图的时代。这时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立，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这实际上是向朝廷闹独立性，属谋反行为。宪宗皇帝决意讨逆，御使中丞裴度是主战派，宰相韦贯之是主和派。韩愈坚决站在裴度一边。他在《论淮西事宜状》中说：“吴元济以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胜，而必胜之师，必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得罪主和派，人们便翻他的旧账。说韩愈在江陵法曹参军时，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甚厚。均子锬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锬，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韩愈仕宦道路上又一次遇到挫折。不过这一次挫折对他的影响并不算大。不久发生了吴元济同党王承宗、李师道派刺客刺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事件。道击裴度，伤其首，坠沟中；裴度毡帽厚，得不死。宪宗皇帝终于下达了围剿吴元济的命令。元和十二年秋天，宪宗诏裴度以宰相身份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韩愈以御史中丞任行军司马（相当于参谋长），军出潼关，韩愈请求先乘传车至汴州，说服韩弘全力剿贼。韩愈随裴度至郾城，观察敌情。韩愈认为吴元济精锐部队均在蔡州边界上拒各路围剿军。守蔡州者皆老弱，人数不过千人，他多次建议裴度，以三千精兵间道突袭蔡州，吴元济必被活捉。裴度未来得及实行，唐、邓、随节度使李愬，从西面攻蔡州，用所得贼将李祐为向导，从文城栅出发，雪夜疾驰百二十里，夜半到蔡，破其门，活捉吴元济。在处理平蔡